

另一半中国梦

——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许洋 李楠 主编



晚清的严复和梁启超发现西方崛起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在几代中国人看来富强是头等重要的，而文明可以缓行一步。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以实现富强和文明的中国梦正幻化成现实，可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梦。富强崛起，文明至今仍处于迷茫之中。



另一半中国梦

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许洋 李楠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 赵汀阳，何帆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86-4075-4

I. ①另… II. ①赵… ②何… III. ①文明观—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532 号

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著 者：许洋，李楠主编，赵汀阳，何帆等著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四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80mm 1/16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978-7-5086-4075-4/K·324

字 数：110 千字

印 张：11.75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传 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信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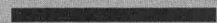
Read More



Think More



Talk Less



目录

观察 /001

另一半中国梦

——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_ 许纪霖 003

俄罗斯，接二连三 _ 闻一 017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及其恶果 _ 徐元宫 031

对话 /039

革命，还是变迁？

——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之二 _ 赵汀阳 vs 雷吉斯·德布雷（法） 041

城市中的恐惧 _ 任雪飞 vs 索菲·博迪·根德罗（法） 055

我接触的风云人物 _ 邢小群 丁东 vs 高锴 063

评论 /081

当不可阻挡之力遇上不动体 _ 李伟才 083

知青电影中的理想主义_启之 095

记录 /113

寻找小糖人_赵涵漠 115

嫁给科林·杜菲

——一个10岁美国小男孩的生活_苏珊·奥尔琳(美) 123

遇见席慕容——在她最美的时刻_江一鲤(台) 133

快乐琴——关于“反右”的私人记忆_潘去病 141


随笔 /157

爱尔兰的霍比特人_何帆 159

厉害男士——赵氏孤儿之五_李敬泽 165

因势利导_冯唐 173

酱酱烧_新井一二三(日) 177



做有思想的出版

Thinker

另一半中国梦—— 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 许纪霖_史学专家 ■

自近代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历史学家雷海宗 70 年前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明危机，至今没有消除。到了 21 世纪，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有了可以与西方媲美的综合国力，然而，文明依然没有崛起，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时刻，我们在文明抉择上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命的是不知彼岸究竟在何处，陷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文明迷失之中。

中华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今天再也无法以“不争论”的发展主义策略绕着走，绕过文明的经济发 展，只会在原地打转，继续在深水区摸石头，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彼岸，渡过文明转型的大河。

现代性：一种新的轴心文明

晚清之后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文明？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自16世纪之后，在西欧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那就是现代文明。它由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种古老的轴心文明演化而来，首先在西欧出现，然后迅速向全球扩张，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其间，正如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所说，现代化成为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

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对此已经有众多的研究和阐释。在这里，我们要将现代文明的两个很重要的层次加以区分：一个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性，另一个是有着明确价值导向的文明。前者与富强有关，后者乃是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在晚清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发现西方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说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谓富强的现代性，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它：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虽然概念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指的是一种价值中性的能力和秩序，它可以与不同的轴心文明和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产生当今世界上各种多元的现代性。具体而言，富强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面是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欧洲自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与统治力，所向披靡，无可抵挡。到20世纪演变为信息技术革命、新能源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等新的形态，继续推进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第二个层面是理性化秩序，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资本主义，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制度，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簿记制度，等等。这套日益普及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殖民化，在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为普遍的秩序法则。第三个层面乃是一种世俗化的精神追求，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体现在对人类欲望的无限释放和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冒险进取精神、对金钱和财富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节俭勤奋的工作伦理。这种没有价值、没有宗教、没有灵魂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自己的生存法则，相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市场的竞争和强者的赢出将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套技术性的以富强为目标的现代性，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性力量，它面目暧昧，不信神灵，唯独崇拜的是自身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与各种世俗化的轴心文明相结合，除了原初形态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之外，如今又分化出儒家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资本主义、印度教资本主义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与各种当代意识形态嫁接，发展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威权主义的现代性等。这一以中性的资本主义面目所出现的现代性，在今日之世界变得如此之强大，正如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感叹的那样，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找到一个替代性的体制。在这个世界上，现代性无所不在，资本主义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确终结，科耶夫所担忧的“普遍同质的国家”已经降临。

现代文明除了富强为中心的现代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层次，那就是文明。严复在晚清的时候将之概括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谓的文明之体，乃是一套现代的启蒙价值观，它以对人的自由与尊严之平等尊重为核心，发展出一套可以与古老的宗教媲美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这套启蒙话语不仅有观念形态，还有相应的建制设置，那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政治秩序三个要素：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制政府（The accountable Government）。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不仅靠的是现代性的物质和理性力量，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文明话语和法政体制，因而它被理解为是一种新的轴心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家文明那些古老文明更具有普世的主宰力量，成为主流文明话语和文明建制。它虽然源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但在扩张的过程之中，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欧洲，而成为被世俗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认同的普世文明，一种脱离了特殊文明背景的世界普遍精神。

然而，现代文明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和紧张：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人文精神与技术至上、民族国家至上与个人权利尊严、发展主义与社会和谐、无限进取与闲适节制……这些现代性互相冲突的两歧面向，都意味着这个新的轴心文明在其内部发展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和裂变，事实也是如此。现代性文明的这种分化，乃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轴心而展开：一个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轴心文明。现代性文明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是19世纪以后发生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

代性的文明基础，这一同质性的现代文明，到了19世纪在其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政治意识形态经过两个世纪的冲突和斗争，又互相内化和融合，在当今形成三种典范性的模式：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俄国或东亚式的威权主义，此外还有更多复杂的混合形态。而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多个失败了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例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极权主义等。

现代文明分化的另一个途径围绕着轴心文明而展开。虽然西方文明到了20世纪彻底征服了全世界，让几乎所有的部落、民族和国家都匍匐在它的脚下，但它同化了众多不具高级宗教和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和地方风俗，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古老的轴心文明，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儒家文明。相反地，西方文明所到之处，激起了各大轴心文明的激烈抵抗，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在文明相遇的同时发生，西方现代文明改造了古老的轴心文明，逼迫其世俗化，向欧洲趋同，但另一方面，成功地内化了西方文明的非西方国家，让现代文明从其母体基督教文明中剥离开来，与自身的文明传统嫁接，创造出现代文明的非西方形态，于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东亚的崛起、印度的发展和中东的革命，现代文明的各式变种出现了，现代性不再属于基督教文明，而呈现出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乃至地方文化结合的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并没有改变现代文明的同一性，它依然呈现出前文所说的富强与文明的两个层次的普世化特征，只是它不再以整齐划一本质主义方式呈现，而是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普世的现代文明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容貌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本质。现代文明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富强、理性、幸福、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和谐等。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需要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欧洲大陆突出平等、民主和社会福利；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

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都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或者说是缺乏普世文明的畸形现代化。

那么，中国的崛起所象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

主流文明的对抗者、追随者，抑或发展者？

2008年之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事实。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实现的是何种现代性？晚清的严复和梁启超发现西方崛起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奋起赶超。然而，在几代中国人看来，富强是头等重要的，而文明可以缓行一步。长期以来，一直是富强压倒文明，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更多关注的不是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及其相应的法政制度，而是技术性的、非价值化的科技、理性秩序及其资本主义精神。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中国梦终于成为现实。然而，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现代性，富强崛起了，文明至今徘徊于迷茫之中。

中国崛起的秘密，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如今已在欧洲衰落的基督新教中的理性化法则、竞争的技艺和勤俭精神，结合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世俗传统，发挥到人性中的极致。当代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像“西方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现代文明的竞争法则从欧洲转移到了东方。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即使在不久后的某一天，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到时候西方人也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明所征服，而且是被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精神所征服！虽然中国统治了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就在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成为无人可挑战的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的内部持续着越来越严重的文明危机：民族的核心价值迷失、社会的伦理秩序混乱、政治制度面临合法性的挑战、政府的权威与信用失落、法治形同虚设……文明的危机与国家的富强形成了颇具讽刺性的反差和对比，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都意味着至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是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所交出的成绩单，而且还是一位严重偏科的“模范生”。

面对中国这一现实，中国思想界内部有着决然不同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普世价值”论，另一种是“中国模式”论。在“普世价值”论者看来，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西方所示范的，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所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今日的问题就在于学西方学得不够，只是一场洋务运动的改革，需要在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上全盘西化。而与此对立的“中国模式”论者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不必模仿西方，中国可以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有自己的文明价值，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崛起将为全球不发达国家提供示范，即使抛弃西方的文明，也同样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

于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面对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中国究竟要当主流文明的对抗者还是追随者？抑或还有第三条道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文化和文明构成两极：文化一词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与此相对的文明一词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以欧洲为例，欧洲文化与欧洲文明是不同的，“欧洲文化以犹太教、基督教为自己的独特底蕴；而欧洲文明则以人本主义、科学技术为特点散布到欧洲之后，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也就是说，文明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一套普世化的价值观念；而文化则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普世价值”论和“中国模式”论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普世的文明与特殊的文化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多次，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德国和土耳其，一个是要

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抵抗英法的普世文明，另一个是要用欧洲的普世文明代替土耳其的特殊文化。然而，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19世纪初英法思想传播到德国时，德国的知识精英用德国的文化去抵抗英法的文明。伊格尔斯指出：“在德国的文化（Kultur）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Zivilisation）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这个“1914年观念”就是抵抗英法普世文明的德意志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从俾斯麦到希特勒，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赶超英法的道路，都是按照这一用德意志的独特性对抗英法的普世文明道路设计和实行的，他们在国家富强层面比英国还要英国，比法国还要法国。不到一个世纪，就从四分五裂的、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称霸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然而，德国所追求的那条与欧洲主流文明对着干的独特道路是一条走向战争、无法持续的死路。“二战”之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决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基督教新教路德宗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在当今欧洲经济一片低迷萧条之际，德国一枝独秀，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所在。

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绝对不是正道，一定是自我毁灭的邪路。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如果仅仅愿意在富强上模仿西方，而在文明的价值和建制上固守自己“独特”的文化，即使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那也只是普世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东方权威主义传统的奇怪结合。这是一种新的中华文明2.0版呢，还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只有物质的征服力，而缺乏精神创造的新文明？在13~14世纪的时候，蒙古人的铁骑不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横扫中亚东欧，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然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而没有精神魅力和先进制度所支撑的帝国是存在不了多久的，不到100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便分崩离析，走向灭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就是主流的现代文明。中国要追求的不是与世界精神对抗的独特模式，恰恰是符

合主流文明，又能将之发扬光大，推向新的精神高峰的普世道路。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而是黑格尔所说的有着轴心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民族，这样的民族对世界精神应有担当，其所作所为都要在普世文明的视野中加以衡量。

那么，像“普世价值”论者那样，死心塌地学西方，将中国变成一个完全欧化的国家行不行？在这方面，土耳其是与德国相反的，用文明代替文化的另外一个例子。与德国相反的是近代土耳其的道路。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20世纪初发生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盘欧化的道路。不仅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彻底世俗化，原来的主流宗教穆斯林被驱逐出所有的公共空间，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而存在。这条用文明代替文化的道路走了差不多100年。土耳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再也无法恢复奥斯曼帝国当年的雄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成为一个被撕裂、无所适从的国家——上层是类似西欧那样的现代文明的制度，而底层依然是无法战胜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这两者之间是断裂的。也就是说，文明一直战胜不了文化，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撕裂。

进入21世纪之后，土耳其开始试图走出这一近代的困境，执政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尝试将普世的现代文明与土耳其特殊的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内在地结合起来，虽然继续保持政教分离的近代传统，但伊斯兰教重新回到社会的中心，不仅是拯救个人灵魂的“心性宗教”，而且也是整合社会伦理和人心的“秩序宗教”。在这一过程当中，奥斯曼帝国末年的思想家格卡尔普又被重新提及。格卡尔普所思考的，是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土耳其如何一方面接受现代文明，一方面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在他看来，当现代性文明到来的时候，原来的伊斯兰文明便后退一步，变为特殊的民族文化，但普世的文明无法替代和取消特殊的民族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自我认同、保持自己文化特殊性之所在。普世的文明构成了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特殊的文化则是民族共同的伦理、宗教和心灵认同。今天的土耳其所实践的正是格卡尔普当年的思路，整个国家显示出一种既与主流文明接轨，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新气象。

从德国和土耳其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用文化抵抗文明，还是用文明代替文化，都不是民族复兴的正道，中国应该走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道，既不当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抗者，也不仅仅是它的追随者，而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者，顺应世界大势，同时借助自身的文化传统，对普世文明的发展与提

升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返世界民族的行列，首先要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在文明的价值和体制的建构上驶出历史的三峡。

“通三统”、公民宗教与宪法爱国主义

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它不得不面对和尊重中国土地上各种已有的文化传统，虽然有些是曾经辉煌过的废墟，有些是尚待发掘的金矿，有些是期待复活的远古传奇。当今中国存在着三种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五四运动以来以启蒙为标志的现代性文明传统和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传统。儒家文明到了20世纪初因失去其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而解体，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文明100年来历经波折，到今天实现了一半，有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秩序，尚未抵达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而历史同样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毛泽东时代走过一段历史的弯路，但其反对资本霸权、追求平等的理念依然在中国有广泛的心理土壤和社会动员能力。对这三种既存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老左派和儒家保守主义有着相当冲突的态度和立场，但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这三种传统都在那里，容不得挑肥拣瘦，不得不面对和正视它们。

甘阳最早提出“通三统”，要将启蒙传统、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统合起来，成为未来的中国新文明。“通三统”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与一神教的西方文明不同，它是多神教的，一神教追求一统，多神教要的是和谐，中华文明以多元一体的方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心灵秩序上，上层的宗教是儒道佛并存，彼此之间相安无事，而底层的民间信仰乃是儒道佛合一，孔子、老子与佛祖共拜。在政治秩序上，乃是霸王道杂之，儒家为普世王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有为的法家和无为的黄老之学则交替作为统治的治理术。不过，无论心灵秩序还是政治秩序，儒家都居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它不像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这样排斥异端的一神教，儒家并不排除其他的神祇，只是将各种外来宗教和民间信仰世俗化，将儒家的一套价值伦理观渗透到异教之中。在政治秩序上亦是如此，福山认为，中国最早发